

《文心雕龍》論曹操

The View of Wen-Shin-Diao-Long on Tsao Tsao

方元珍 (Yuan-jen Fang)

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摘要 Abstract】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為漢末之際政治情勢、學術思潮、文學風格轉變的關鍵性人物。劉勰以洞察的鑒別力，簡要的語言，於《文心雕龍》一書，精準地掌握曹操人品、才性的特質，其作品特色與戰亂時代、政治身分的關聯，及曹操在建安文士中扮演的領袖地位；也在文體大備的當代，適切援用曹操對文體作法的意見，足以說明文體的寫作旨要與發展的流變。

然而，魏武兼融儒墨道法的思想，對其詩文明古而能創新、言語樸質率直的影響；與曹操樂府詩作的內容、音樂聲調，及其在詩歌史上獨特的表現、應有的地位等，劉勰或隻字不提，或語帶貶抑，此固因劉勰評詩、論文、賞樂有其標準，而用語的概括、籠統，也是使正確評騭受限的原因。

Tsao, Tsao wielded his military and literary talents at crossroads, in a time when political situations, academic trends, and literary styles were changing. Liu, Hsieh (the author) shows his fine grasp of Tsao, Tsao, in depicting Tsao's personality, talents, the uniqu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 works and the upheaval years as well as his political status, and Tsao's leadership among the Chien-An literary figures. Above all, Liu, citing Tsao's view about literary styles, was able to present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writing and its development.

Tsao showed his combined knowledge about four different schools in his writings. His poetry exemplified classic models, but, at the same time, exhib-

ited creativity, too. His language was unsophisticated and direct. However, Liu either never mentioned Tsao's unique performance and standing in poetry. He simply ignored the content and rhythms of Tsao's (樂府詩作). Even if Liu talked about it, he did not hide his disregard towards Tsao's poetry. This could be that Liu's literary comments, though with his declared high standard, was restricted by his own unclear, vague language.

關鍵詞：文心雕龍、劉勰、曹操、建安文學

Keywords : Wen-Shim-Diao-Long, Liu Hsieh, Tsao Tsao,
the Literary of Chien-An

畢生在戰場出生入死的曹操，軍功顯赫，除了建安十三年敗於赤壁之戰，降黃巾、討袁術、滅袁紹、定劉表，平定天下，攻無不克，連他自己都頗自豪於「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¹；雖然「挾天子以令諸侯」、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及唯才是舉，不計品德的做法，在歷史上遭人非議，碩儒朱熹、王夫之、顧炎武等均持負面評價，但基本上其幹才仍受肯定，被視為英雄²，當之無愧。尤其難能可貴的，據曹植〈武帝誄〉云：「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曹操於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之際，亦成書《魏武帝集》三十卷，雖大部分散佚，現存猶有二十餘首詩、文一五〇餘篇、孫子注十三篇等，無論四、五言詩、詔令、章表等，既融匯漢末魏初學術、文學的潮流與風貌，也呈顯個人的創作特質，遺響不絕於後。同時，他並以政治領袖的身分，結集文學之士於鄴下，推動建安文學的鬱然興起。對於如此一位超世之傑³、文壇盟主，劉勰是否曾予關注？評論的焦點與標準何在？本文將試予探究。

劉勰對曹操的評論，散見各篇，或述及曹操的家世、人品，或探究其與建安文士的互動關係，及具有時代精神的創作特質，或評論曹操詩文的表現，或引述曹操對文體作法的意見，雖論述不多，未成體系，但所言大抵中肯，足供採擇：

論曹操的家世與為人

〈文心雕龍·檄移〉篇裡，曾評論陳琳為袁紹所作之〈檄豫州文〉：

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闖攜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傲然暴露。敢矣！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

1 見曹操所寫〈讓縣自明本志令〉。

2 魯迅於〈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說曹操「實際上具有非常的才幹，至少可以說是一個英雄。」

3 見〈三國志·卷一〉引〈魏書〉。

劉勰認為這篇寫給劉備，共謀討伐曹操的文字措辭雄勁有力，直言不諱，只是述及曹操乃宦官曹騰之後，其父曹嵩為曹騰養子，揭人隱私，未免過當；又謂檄文中，控訴曹操曾命將士、設官職，挖人祖墳，掠取金寶之事，乃誣蔑事實，過分誇大。按陳琳〈為袁紹檄豫州〉一文云：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宦、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與金犖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僞狡鋒俠，好亂樂禍。……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奪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其中有關曹操先人出身的描述，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云：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曹操身為宦官之後，縱使其先祖位居封侯，深受皇帝寵信，但社會地位畢竟不高，更何況其父連出身本末都無法確知，故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道：

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

顯然曹操的出身，使他亟欲有所表現，以建功立業，樹立名聲，使天下人能識，故其作品亦常流露此一安民拯世的英雄心態。

曹操發丘摸金之事，則見於《魏書·袁紹傳》，姑不論發丘摸金之事是否屬實，而陳琳檄文確有因立場傾向袁紹，而刻意貶低曹操人品之處，其文字字控訴，均以負面誇飾形容。他如此辱罵曹操，而當建安九年袁氏兵敗，陳琳降曹，曹操僅對之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終因愛才而未追究。觀曹操所以能成就軍國大業者，知人善任，不念舊惡，為重要原因。如荀彧之去袁紹而來歸曹操，操視同子房，用為司馬、畢諶先逃後復生得，被任為魯相，俱為顯例。蓋曹操求才之心，未曾或忘，建安十三年，撰〈短歌行〉，表達思賢若渴的願望，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分別撰文〈求賢令〉、〈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都顯示其亟欲得賢，以助其統一天下的心願。正因如此，曹操為達成現階段目的，也常因而剷除阻礙，如名士邊讓「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被殺⁴、孔融、許攸等「皆以恃舊不虔見誅」⁵，

4 見《後漢書·邊讓傳》。

5 見《三國志·崔琰傳》。

荀彧、崔琰素為操所倚信，功在曹氏，也為阻撓曹操稱帝之意而被賜死，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七因稱曹操用人之術為「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故劉勰先謂陳琳冒犯曹操的鋒芒，為「敢矣」，又稱陳琳於黨附袁紹的罪名下，免遭殺戮，為「幸哉」，兩句歎詞，固然顯示劉勰愛陳琳之才，而稱其敢為之識，歎其遭遇之幸，然亦可謂深識曹操之人品。其評陳琳之檄文，既不迴護陳琳，論曹操之行事作風，也不偏袒曹操，劉勰持說之平理若衡，值得肯定。

論魏武之世貴刑名

《文心雕龍·論說》篇曾分析議論文的興起與演變，云：

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

指出魏初議論文的勃然興盛，與當時講倡刑名的學術思潮有密切的關係。由《御覽》引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即可瞭然。此一尚名法的學術風氣，又與曹操有連帶關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覽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謂曹操善用法家之術，循名責實，使人盡其才，故能成就霸業；《資治通鑑·魏紀一》則說：「用法峻急，有犯必殺。或對之流涕，終無所赦」，不但說明持法峻刻，執法如山是曹操政權的優點，同時也道出刑殺過度，可能誅及無辜的缺點，曹操用法的實際情形，由此可見一斑。曹操重法的理念，也屢見於其詩文，《以高柔為理曹掾令》云：「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選軍中典獄令》云：「夫刑，百姓之命也」，均以刑法為治民之要。晉人傅玄上疏，並進一步指出「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可見由於曹操的提倡於上，魏初崇尚名法之術已蔚為風氣，如傅嘏、王粲、荀粲、裴徽均以善言名理著稱，並為「迄於正始，無務守文⁵，何晏之徒，始盛玄論」⁶，奠立基礎。

曹操既尚名法，政治方面顯著的改變是取士的標準。他敢於突破古人以孝治天下的圖騰，於《舉賢勿拘品行令》一文中，揭示「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的論點；《求賢令》亦云：「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以盜嫂受金之徒而有才者得而用之，實言人所不敢言。觀曹操所以發表此種言論，誠與漢末歷史背景有關，漢末政治、社會、軍事動亂不已，清議氣節之士，高倡尊崇名節，敦勵廉隅，對亂象的興革，

6 見《文心雕龍·論說》。

緩不濟急，並無實際的助益，故曹操在〈論吏士行能令〉中明白指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他並非反對儒家的用人觀點，而是基於時勢所需，擇用實際能治國用兵之士。曹操務實、尚軍功的取士標準，基本上，仍是刑名思想的發揮。以名法思想救天下、治人心，此其本意。

文學方面，曹操的刑名思想，亦牽動其詩文的風格。《國故論衡·論式》篇曾云：「老莊刑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相同地，受名法盛行影響，不拘泥於章句煩複的釋義，簡潔樸直，成為曹操詩文的特色。如建安七年所寫〈軍譙令〉：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
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
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
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全文可分四段，「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乃說明興義兵的原因，自「舊土人民，死喪略盡」，至「使吾悽愴傷懷」，則敘述興義兵的結果，以下「其舉義兵以來」，迄乎「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載錄興義兵的善後情形，而以「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的期望終結，文字條理分明，質樸簡要，無一廢言。又如〈讓縣自明本志令〉云：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然欲孤使
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
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

言語之坦誠率直，恐尚無人敢言、能言。至於〈薤露〉詩，斥責何進為「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更是流露曹操詩歌樸直的特色，所以鍾嶸說「曹公古直」，不僅其詩如此，其文亦然。復由曹操詩中所描述的自然景色多為高山峻嶺，深湍急流，如〈卻東西門行〉云：「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步出夏門行〉云：「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豐積深奧」等，也意味曹操心境少舒緩平和之氣，而具有法家肅殺嚴峻的氣質。按驗於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所說：

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
還，士民秉禮，迨及建安，漸尚通佻，佻則侈陳哀樂，通則
漸藻玄思，二也。

顯示曹操因受刑名思想的薰染，在詩文的表現上，呈顯出「清峻通悅」，也就是簡約嚴明，直抒其懷，不尚雕琢的風格。

魏武之世，尚法術，好刑名，既如劉勰所言，也因而牽動曹操政治、文學的表現，已如上述，然而曹操並未持反對儒學的立場，同時還雜揉道、墨的思想，進而對其詩文，及建安文風都有影響，這是值得重視，而劉勰未加探究的部分。年甫二十，曹操因舉孝廉為郎，後靈帝推舉能通尚書、左氏、穀梁春秋者各一人，悉除議郎，而曹操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軍旅期間，並「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足徵其早年以具備儒行而任官職，且國學根柢深厚。建安八年，曹操頒〈修學令〉：「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可見其對儒學之重視。在其詩文中，更常援用經典，熔儒墨道法思想於一爐。〈苦寒行〉的「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短歌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語出《詩經》；〈善哉行〉歌頌古公亶父的「積德垂仁」、太伯仲雍的「王德之仁」、晏子平仲「積德兼仁」，都是贊美儒家的人物與政風；〈對酒〉中「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班白不負戴。……卻走馬，以糞其土田。……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的政治理想，可說是《孟子》、《禮記》、《老子》、法家思想的薈萃，〈度關山〉裡「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皋陶甫侯，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侈惡之大，儉為共德。……兼愛尚同，疏者為戚」的理想社會，則是融合儒法墨諸家的政治宣言。此一兼容並蓄的思想淵源，使曹操能以開放的心態，不致於墨守成規，食古不化，用人揭櫫「唯才是舉」的號召，樂府詩「體復古而用開新」，進而樹立建安文學之特色，皆以此故。

論與建安文士的關係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蕃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以曹氏父子為建安文學的領導人物。《文心雕龍·時序》篇則有進一步的闡述：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按曹操爲丞相，時在建安十三年，以異姓封王，乃建安二十一年，這段期間，呂布、張邈、袁術、劉表、袁紹父子、馬超、韓遂等群雄割據的局面，已被曹操逐一殲滅，三國鼎立的態勢大致形成，混亂的政局稍現平靜，此即劉勰所稱「建安之末，區宇方輯」。政治局勢的安靖，使曹操有餘力「朝攜壯士，夜接詞人，崇獎風流」，據曹植《與楊德祖書》云：

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

按建安七子除孔融於建安十三年被殺，阮瑀、陳琳、劉楨、應瑒、徐幹、王粲等先後被曹操延攬入幕，王粲並以勸劉琮歸降有功，賜爵爲關內侯；迨至曹操爲丞相，以曹丕爲五官中郎將，曹彰、曹植皆封侯，建安諸子多被任爲曹丕、曹植之文學、庶子等僚屬，王粲則用爲侍中，掌理曹操之典章制度，其他文士「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以百計」⁷，一時之間，詩文往還，形成鄴下文風的鼎盛。尋繹曹操所以能成爲此時期文風薈萃的倡導者，固與其地位的尊貴、重視文士，授予官職的身分有關，而《通鑑漢記》所言：「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的政治因素，與曹操亟需能文之士代筆作文的事實需要，也是文士齊集鄴下的主要原因，加以曹操性好文學，《宋書·臧燾傳論》嘗言：「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創作許多優秀的作品，才能匯聚成建安文學的滔滔洪流，反映劉勰所謂「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的實況。

論詩文的風貌

劉勰在《文心雕龍·樂府》、《時序》等篇，評論曹氏父子之樂府詩及建安文風時，曾述及曹操作品內容、音調及風格上的表現，如《樂府》篇云：

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悵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詔夏之鄭曲也。

劉勰認爲魏之武帝、文帝、明帝，以爽朗明麗的才氣，創作樂府，由於題辭變易，樂部剖分，致使聲調有所損益，音節趨於靡平，而曹操「北上太行山」、曹丕「秋

7 見《詩品·序》。

風蕭瑟天氣涼」等篇，或敘暢飲歡宴的遊樂，情志放蕩，或感傷羈旅征戍的愁苦，思緒悲哀，其音節雖合三調之正，但仍屬韶夏之鄭聲。

文中，劉勰以「氣爽」形容曹操的才情，可謂知人之論，同時也具體而微地呈顯曹操樂府詩內在的精神特質。而由《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太祖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宋書·樂志》云：「漢世有相和歌，本出於街陌謳謠，而吳歌雜曲，始亦徒歌。復有但歌四曲，亦出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尤好之」，可知曹操具有音樂素養，並常以音樂配合作詩。故曹操詩現存二十餘首，全為樂府，並以相和歌辭為多。惟曹操所作樂府歌辭，雖沿用漢樂府的舊調舊題，但並不襲用其古辭古意，而是繼承樂府民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寫實精神，別出新意，自鑄偉辭，如〈蒿里〉、〈薤露〉本是輓歌，曹操用以詠懷時事，清人沈德潛《古詩源》因說：「借古樂府寫時事，始於曹公」，王士禎《帶經堂詩話》亦云：「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遂謂之古詩亦可」，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尤指出建安時期樂府空存舊目的現象：

知無論歌，詩，賦，入樂時每多增刪修改，不盡存本來面目。

此即劉勰所謂：「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指曹氏父子以樂府體裁自由詠懷，不受原題原意原調的限制，變舊作之體；然而曹操的詩歌是否「音靡節平」？據沈德潛《師友詩傳錄》云：「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此乃樂府詩音樂的本來面貌；驗之於曹操〈短歌行〉，屬相和歌平調曲，古辭已佚，而據《樂府解題》說法，長歌、短歌以指歌聲長短為是；曹丕〈燕歌行〉既寫道：「短歌微吟不能長」，曹操〈短歌行〉亦云：「慨當以慷，幽思難忘」，則原有歌聲激越不平，以與作者心情相應，可以想見。《古今樂錄》引王僧虔《技錄》又曰：「魏文製此辭，自撫箏和歌。……此曲聲制最美。」，則原曲音節似乎不致「音靡節平」。再看曹操的〈苦寒行〉，據方東樹《昭昧詹言》云：「大約武帝詩沈鬱質樸，氣真而遂層頓斷，不一順平放」，亦非音靡節平之屬；且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曾說：「建安七子之文，愈講音節……，大凡文氣盛者，音節自然悲壯」，曹操詩歌在建安諸子之中，氣勢最稱雄健，音節亦當歸於悲壯為是。三者，操詩每為章句間重疊句之運用，以後章首句與前章末句相呼應，如〈氣出唱〉：「乘風而行，行四海外」、〈短歌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秋胡行〉：「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

此道當何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等，此一形成連鎖，相互連繫之句法，每使詩歌音節合拍勻稱而緊湊，聲如貫珠，音韻和諧。今稽考於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引《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則劉勰所謂「宰割辭調，音靡節平」，殆或指明帝歟？

劉勰又稱「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悵蕩，辭不離於哀思」，乃以交錯句法，謂〈北上〉眾引，乃敘酣宴，志不出於悵蕩；〈秋風〉列篇，則傷羈戍，辭不離於哀思。今據《宋書·樂志》所載：

相和歌辭駕六龍（當〈氣出倡〉），厥初生（當〈精列〉），
 天地間（當〈度關山〉），惟漢二十二世（當〈薤露〉），關
 東有義士（當〈蒿里行〉），對酒歌太平時（當〈對酒〉），
 駕虹霓（當〈陌上桑〉），皆武帝作。……平調則周西（〈短
 歌行〉），對酒（〈短歌行〉），爲武帝詞。……清調則晨上
 （〈秋胡行〉），北上（〈苦寒行〉），願登（〈秋胡行〉），
 蒲生（〈塘上行〉），爲武帝詞。……瑟調則古公（〈善哉
 行〉），自惜（〈善哉行〉），爲武帝詞。……此外武帝有碣
 石（大曲〈步出夏門行〉）。

其中除〈塘上行〉爲棄婦之辭，疑爲文帝甄后所作⁸，其餘樂府詩皆曹操所作。內容涵蓋豐富，有寫實的〈薤露〉、〈蒿里〉，弔唁其父的〈善哉行〉，征戰思鄉的〈苦寒行〉（又稱〈北上行〉）、〈卻東西門行〉，寫景抒懷的〈步出夏門行〉，求賢若渴的〈短歌行〉，表達政治期望的〈對酒〉、〈度關山〉，嚮往神仙遨遊的〈氣出倡〉、〈精列〉、〈陌上桑〉、〈秋胡行〉，並無劉勰所謂「觀其〈北上〉眾引……或敘酣宴，……志不出於悵蕩」之辭，故《文心雕龍》黃叔琳注云：

按魏太祖〈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云云，通篇寫征人之苦。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云云，亦託辭於思婦，所謂或傷羈戍，辭不離於哀思也。他若文帝於譙作孟津諸作，則又或述酣宴，志不出於淫蕩之證也。

亦認爲劉勰「或敘酣宴，志不出於悵蕩」之語，當指曹丕部作品爲是。

此外，劉勰又將魏之三祖，所作〈北上〉眾引、〈秋風〉列篇評爲「雖三調之

8 朱柅堂《樂府正義》：「凡魏武樂府諸詩皆借題寓意，於己必有所爲，而「蒲生」篇則但爲棄婦之辭，與魏武無當也，知其非魏武作矣。」按郭茂倩《樂府詩集》以爲是甄后作。

正聲，實韶夏之鄭曲」，據范文瀾注云：

彥和云「三調正聲」者，三調本周房中曲之遺聲。……然則三調之爲正聲，其來已久。彥和云三祖所爲鄭曲者，蓋譏其詞之不雅耳。

范注認爲劉勰以相和歌中的清調、平調、瑟調爲「三調之正聲」，可謂其來有自，又說劉勰云「實韶夏之鄭曲」，乃譏三祖樂府諸作文辭不雅。然操詩屬辭樸實，胡應麟《詩薈》稱：「魏武太質」，已有定論。如寫時事的《蒿里行》云：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殘。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描述漢末連年紛擾征戰，民不聊生的情景，用語平鋪直敘，意境蒼莽雄闊，所以方東樹《昭昧詹言》評曰：「極寫傷亂之慘，而詩則真樸雄闊，遠大極矣」，又如寫景抒懷的《苦寒行》，又稱《北上行》云：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樑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

本詩宛若一幅風雪軍旅圖，寫景抒情，全無雕琢，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二評說：「沈鬱質樸，……尋其意緒，無不明白」，故鍾嶸《詩品·序》亦云：「三祖之詞，文或不工」，指出曹操詩文言辭有欠工麗，但非不雅的特點。因此范注認爲劉勰所謂「實韶夏之鄭曲」，乃指《北上》眾引等文辭不雅，實於義不合。而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樂府》篇云：

蓋魏武初政乃偏羈之雄略，非休明之盛軌，文帝纂統，復崇尚放曠，不務儒術，影響及於文學，武既悲涼，文或悵蕩，皆非中和雅正之音，故雖美其氣爽才麗，而終斥爲韶夏之鄭聲也。

《校釋》所言，能由曹魏之政治情勢、文學特點，及劉勰「樂教」之觀點入手，說明劉勰所以指斥《北上》眾引爲「韶夏鄭聲」的原因，洵爲知言。按曹操樂府詩「樂由心生」，非中和雅正之音，與劉勰評論樂府「樂本心術，……務塞淫濫，……

情感七始，化動八風」的標準不符，〈北上〉眾引因而被指為「韶夏鄭聲」，可以推知。

《文心雕龍·時序》篇還述及曹操及建安文學之風格：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文中提到戰亂流離的時代社會，與曹操特殊的政治地位，確實是形成曹操詩文特色的兩大背景因素。按曹操的作品，約可以建安十二年即赤壁之戰前一年為準，分為兩期，五十三歲以前為前期，其時黃巾、董卓為禍，群雄割據，天下大亂，民俗澆薄，曹操詩文屢見批政局動盪、憫百姓流離，傷風俗敗壞的作品，代表作品有〈蒿里行〉、〈薤露〉、〈善哉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修學令〉、〈整齊風俗令〉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發生，鼎立之勢形成為後期，曹操之地位、功業日趨穩定，筆下英雄霸氣自然流露，而年事漸高，統一不易，不免心生英雄遲暮，憂世不治，而亟求賢才之感，代表作品有〈短歌行〉、〈卻東西門行〉、〈求賢令〉、〈讓縣自明本志令〉、〈舉賢勿拘品行令〉，及表現延年思想以求心神慰藉的遊仙詩：〈氣出唱〉、〈精列〉、〈秋胡行〉、〈陌上桑〉等。可以說憂傷時代社會的紊亂疾苦、與平治天下的使命感，是他詩文的經緯線，也是前後期作品的主軸。前期的〈薤露行〉寫道：

惟漢廿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
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
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對於東漢末年群雄兼并、宗廟被燬，皇室播遷的混亂局面，曹操善以居高臨下，抓住事物大關目的著眼點，僅用十六句，便以極顯豁的筆墨，直抒胸臆，勾勒出雄闊的畫面。由於身經喪亂，目睹國家殘破，生民塗炭，曹操傷時憫亂，筆下便多悲涼之氣。後期的〈短歌行〉則寫：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

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
哺，天下歸心。

此詩張玉穀以爲旨在「歎流光易逝，欲得賢才以早建王業之詩」⁹，陳沆亦指出「此詩即漢高〈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¹⁰，按劉邦思得猛士以守四方，而曹操亟思賢才以統一天下，故其思想基調相似，而詩末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自比，「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自期，更見其身居廊廟，憂心天下，卻具有雄才大略的胸襟，積極進取的精神，因而使他的詩文悲涼而慷慨，沒有頹喪、失志、悲觀的情調，即便是群臣疑曹操有不遜之志，他亦爲書自明，以齊桓、晉文、周文王自勉，於〈讓縣自明本志令〉云：

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
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
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

其心繫於早建王業的英雄之思，甚可見於遊仙詩：〈秋胡行〉之二云：「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曹操不傷年往，但思雄圖霸業的理想與抱負，乃迥異於樂府以敘事爲主，且不同於古詩十九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¹¹，只知憂思生命如朝露，故能撼動人心。正因有此歷經喪亂，身居廊廟，而憂治天下的特殊背景，使得曹操的作品蒼涼悲壯，富於英雄的激昂發揚之氣。無怪乎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時序》亦認爲：「漢末大亂，民怨沸騰，魏武雄興，志存戡定；文帝纂業，雅好詞華，影響所及，文風亦慷慨而多氣」，對於劉勰所謂「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的說法，推許爲「溯河窮源之論」。

論曹操在詩歌上的地位

曹操在中國詩歌史上，有其不可移易之地位與貢獻，其以質樸率直的語言，寫實敘事的內容，沿續樂府民歌的路線，又以古題自創內容，悲涼中不失昂揚的精神，開創樂府詩的新局，馮班《鈍吟雜錄》便說：「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劉熙載《藝概·詩概》亦云：「曹公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

9 見張玉穀《古詩賞析》卷八。

10 見陳沆《詩比興箋》。

11 鍾嶸《詩品》謂古詩「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缺乏英雄之氣。

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都是推崇其詩歌表現的獨特性，黃季剛《詩品講述》並為曹操在詩歌史上予以定位：

詳建安五言，毗於樂府。魏武諸作，慷慨蒼涼，所以收束漢音，振發魏響。

一方面指出曹操對樂府詩的繼承與創新，乃是「收束漢音，振發魏響」，有兼籠前美，作範後來之作用，一方面則說明建安五言詩之蔚然興起，源起於樂府詩，與曹操的首倡有關；曹操的五言詩，可說是建安詩歌由質轉文的交界點。其實，不只五言詩的發展，有其貢獻，曹操的四言詩最多，亦成就可觀，沈德潛《古詩源》說：「曹公四言於三百篇外，自開奇響」，表面上四言詩繼承了《詩經》的語言，但曹操的四言詩如《步出夏門行》、《短歌行》、《秋胡行》等，恢闊開張，氣度非凡，已凌轢《詩三百》的畛域，而非仿製品，無怪乎人稱曹操為「振興四言詩的作家」。除此以外，曹操還有雜言詩：《對酒》、《氣出唱》、《陌上桑》等，保存雜言體古樸的作風。雖然如此，但鍾嶸的《詩品》將曹操的詩列居下品，《文心雕龍·通變》篇只說：「魏之篇製，顧慕漢風」，只看到沿承部分，未提魏文不同於漢製，有所創新的部分¹²。《明詩》篇論述四、五言、雜言詩的流變，標舉代表作家，也對曹操隻字未提。王世貞《藝苑卮言》曾為曹操屈居下品抱不平：「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許學夷《詩源辨體》則分析曹操詩列下品的原因，云：

嶸《詩品》以丕處中品，曹公及叡居下品。今或推曹公而劣子桓兄弟者，蓋鍾嶸兼文質，而後人專氣格也。

其說甚是。按鍾嶸對曹操詩歌的評語為：「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所言的當，顯見其非不知操者；而觀其對曹植的評語：「魏陳思王植詩，……其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顯然鍾嶸乃受限於時代潮流以組麗為工的標準，選取文質並茂的曹植列為上品，而曹操則以文字的質樸欠工麗，未受青睞。至於《文心雕龍·明詩》篇所以未列曹操者，析其原因，或有二端：一與劉勰專闢《樂府》，而曹操詩盡為樂府有關。惟《樂府》篇云：

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

劉勰既以詩之可歌，另標「樂府」，此處又將曹陸不協律之作，亦名樂府，可見劉

12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附錄：「文心雕龍諸書，或以魏代文學與漢不異，不知文學變遷，因自然之勢，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

總對詩樂之畫界，漫汗難明¹³；再者，〈明詩〉篇述及建安詩歌的特點，云：

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躍，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其中文帝詩如〈大牆上蒿行〉、〈善哉行〉、陳思詩如〈野田黃雀行〉、〈當來日大難〉，均宴遊之作，由《樂府詩集》載錄於相和歌辭瑟調曲中，乃依古題，用申今意的樂府詩，可見劉勰《明詩》篇所列建安時期之五言詩，亦雜有樂府詩；更何況劉勰以「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形容建安文學之共同特點，用評曹操之詩，亦頗允當。故以詩、樂兩分，做為曹操詩未獲標舉於〈明詩〉篇採擇的理由，並不合適。按驗於〈明詩〉篇云：

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
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

而曹操詩，文字樸實質直，乏中正和平之響，以雄恣霸氣取勝，不符劉勰四言詩「雅潤」、五言詩「清麗」之擇詩標準，此即劉勰不著一字之由。

論曹操對文體方面的看法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云：「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曹操生於東漢之末，一些有關文體作法的觀點，為劉勰所引述，見於《文心雕龍》〈章句〉、〈詔策〉、〈章表〉等篇，大抵表示肯定。如〈章句〉篇，魏云論賦之用韻云：

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質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蹙；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

其中「魏武論賦」，《玉海》二〇四引作「論詩」，范注以為「詩賦亦得通稱」，而劉勰所引魏武之言，今不可見，唯其稱曹操論詩賦不喜一韻到底，工於換韻，雖

13 黃季剛《文心雕龍札記》云：「案彥和作樂府篇，意主于被弦管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擬作，則事謝弦管者亦附錄焉。故知詩樂界畫，漫汗難明。……但有樂府之名，無被弦管之實，亦視之為雅俗之詩而已矣。」

曹操〈滄海賦〉、〈登臺賦〉只存殘句，無法得知其用韻情形，猶可自曹操詩歌窺得全豹。以〈氣出唱〉為例：

遊君山，甚為真。確磈砢，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階
玉為堂，芝草生殿旁。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
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

前四句採真韻屬第十二部，後七句轉為唐、陽韻，古音均屬第十部。又如〈精列〉詩云：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
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
見期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
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
何，時過時來微。

前四句為之韻屬第一部，後二句轉為尤韻屬第三部，七至十一句再轉回之、哈韻，同屬第一部。則曹操除無韻詩以外，用韻情形確如劉勰所言：「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質代」，有美其變之意。依劉勰看來，枚乘、賈誼、陸雲詩賦四句兩韻就轉換的情形，如賈誼〈鵬鳥賦〉云：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殉財
兮，烈士殉名；誇者死權兮，品庶每生。

「我」、「可」為韻，「名」「生」為韻，是兩韻即轉韻，劉勰謂之「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而劉歆、桓譚「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故劉勰認為轉韻應該適中，所謂「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此一觀點，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曾有評述曰：「舍人論文家用韻，主魏武質代之說，而參以折中之論，可謂圓到無餘蘊矣。」

《文心雕龍·章句》篇又論及魏武詩歌不好用「兮」字的情形：

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於句外。尋兮
字承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
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劉勰舉魏武為例，謂其不好用「兮」字，或以無益於文義的緣故；查考曹操詩作，雖不用「兮」字，而其他虛字常見，如「君子以弗憂」（〈精列〉）、「號泣而且行」（〈薤露〉）、「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但為君故，沈吟至今」（〈短歌行〉）、「小白不敢爾」（〈短歌行〉其二）、「幸甚至哉，歌以言志」（〈步出夏

門行)等，藉由虛字之旋轉其間，使文句流利，不致落入滯相，可見曹操能嫻熟發揮語助詞在詩中的作用，與劉勰論語助詞「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之旨歸相符契。！

劉勰並於〈詔策〉篇，援引曹操之說，以明敕戒文體之作法：

「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

按「戒敕」乃「詔策」中之一體，而「敕戒」之用法有別，帝王告誡稱「敕」，他人告戒則稱「戒」。同篇劉勰又云：

戒者，慎也。……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

說明自東漢馬援作〈戒兄子嚴敦書〉之後，名臣碩儒都留有「家誡」文字，以訓誡後嗣。今雖無法查考曹操「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之文字，然曹操現存有〈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敕王必領長史令〉、〈內誡令〉、〈戒子植〉等作品，前兩篇用以戒勵百官、贈封官職，後兩篇則訓示內眷、子弟，均深得體要。〈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云：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全文以短語、頂真相續，簡潔有力；次舉史事爲證，德才相反而相濟，可收反襯之效；末段作結，既呼應前例，又以偶句收束，不僅說服力強，且字無虛發，切中事理。〈戒子植〉云：

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行。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

以同年爲斷，將人我對比，要約明暢，期勉少主之情，溢於言表，此正魏武所謂「指事而語，勿得依違」，足見曹操敕戒之作品能實踐其理論，劉勰之選言舉例，乃信而有徵。

〈章表〉篇又舉述曹操關於章表作法之意見：

昔晉文受策，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

爲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如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壯；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

文中曹語無考，僅《藝文類聚》五十一載建安元年曹操上書讓增封曰：「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審其語意，以四讓爲過，據《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應劭《漢官儀》：「凡拜，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脚贊，御史授印綬，公三讓然後乃受之。」可知讓表以三爲止，曹操所言，合乎朝儀。曹操又稱：「勿得浮華」，以爲章表寫作之圭臬。今據劉師培《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云：「六朝人所作章表貴在立言得體，而不在駢羅事實，不肯割愛，轉爲文累」，知建安所作章表以質實爲重，原因是「建安三國之重名實而求深刻也」¹⁴，乃受當時尙刑名之風氣影響使然。觀曹操《陳損益表》、《請增封荀彧表》、《表論田疇功》、《讓九錫表》、《上器物表》等文，或陳情、或薦舉受封、或辭封、或獻上，皆下情上達，直指情事，文如其人，不尙浮華，故劉勰云：「魏初章表，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頗能掌握魏初章表之大致情形。而其並標舉孔融《薦禰衡表》、孔明《出師表》二篇，以爲範文。若與操文相較，孔融造辭典麗雅正，孔明公忠體國，情真語摯，皆勝於曹操，故劉勰推許二人爲表中之英傑。由《章表》篇云：「必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定勢》篇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曹操章表不合文質相勝之要求，表文未受垂青，亦預料中矣。

結 論

綜觀劉勰對曹操之評論，在表現手法上，有三種：一是專指其人，如《檄移》：「指曹公之鋒，幸哉」、《時序》：「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章句》：「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質代」、《章表》：「曹公稱爲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等，由於人、事、觀點明確，劉勰之評述皆有本有源，褒貶互見，能持平地反映曹操的家世、人品，如實地呈現魏武在建安文學的倡導地位；而掌握社會動亂，民俗偷薄，與身居廊廟，憂世不治的背景，對曹操悲涼慷慨的文風的影響，也稱得上是獨具洞見。至於曹操對於文體的

14 參劉師培《漢魏專家文研究》十三「文質與顯晦」。

意見：敕戒、章表的作法、詩賦的用韻等，劉勰大抵均表贊同。劉師培《中古文學史》所言：「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新辨別文體，其說不淆」，亦對漢魏之際，文家論辨文體予以肯定。

一是籠統泛稱，如〈論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樂府〉：「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敘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悵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等，由於多與時代思潮、眾多作家並稱，劉勰只能舉其梗概，或忽略曹操融合儒墨道法思想，兼融並蓄之態度，使其明古又能創新，進而對詩作的體有所因，詞貴獨創，章表詔令的樸實無華，及建安時期的文風均產生影響；或評論曹操遊宴淫蕩的詩作、與樂府詩音節靡平的表現，有所扞隔，此乃劉勰論文言簡意賅，受限於駢文對偶句法所致。至於論建安作家，只能述其共相，所謂「並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而無暇論及個別作家之殊相，如曹操作品恢闊悲涼中，不失英雄激昂發揚之氣的特質，更是受限於題材範圍，無法深究探索矣。

劉勰尚有一種不言之評，亦值得重視。以曹操而言，其振興四言，自開奇響，並為五言詩盛行於建安首開其端，在詩史上已獲得「收東漢音，振發魏響」的評價，而劉勰於〈通變〉篇未識魏文承先啓後的地位，〈明詩〉論及四、五言詩時，對曹操隻字未提，〈樂府〉亦未贊同操詩音樂的表現，此因劉勰論文有其標準，詩樂固然要合乎「中和之響」，以敦風勵俗；而「四言雅潤」、「五言清麗」、「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的評騭準則，亦會心有得，曹操不符此一要求，後人只有徒歎遺珠矣。